

## 數位資本主義與發展傳播的迷思

郭良文\*

### 壹、發展傳播、實用主義與現代化理論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進入了美、蘇對峙的冷戰時代，撇開當時蘇聯、東歐、中國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不談，所謂「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 指的是以英、美、西歐等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強國，除了澳洲與紐西蘭之外，這些國家都集中在北半球，並且以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國家為核心。而其他被資本主義體系範圍納入的國家，則統稱為「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主要包括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等國家，多數南半球的國家屬於在第三世界的分類當中。所以除了有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稱謂之外，尚有所謂 The North (北半球國) VS. The South (南半球國) 之區分。

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之後，很多參戰國都元氣大傷，亟欲復甦與進行重建，因此，1950 與 1960 年代，從東方到西方、從南半球到北半球，或無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都陷入一個渴求發展的年代。在西方國家中，「富國強兵」、「工業化」、「都市化」與「經濟成長」等現代化 (modernization) 進程，成為重要的追逐目標。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除了在自己的國家勵精圖治之外，並透過介入第三世界的發展而使資本主義陣營更加茁壯，以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充。在這個時期，以功能主義與實用主義為基礎的「發展傳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成為美國傳播學領域中有關媒介角色、以及社會與國

---

\* 郭良文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E-mail: lwkuo@mail.nctu.edu.tw

家發展的主流觀點。Mowlana 指出：

「『發展』這個概念架構對個人、制度、國家與國際變遷，以對成長的廣泛運用，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的現象，在 1940 年代，尤其是 1950 與 1960 年代，發展這個概念等同於成長、現代化、變遷、民主、生產力、工業化、以及其他西方的歷史與演進變革…發展，同時作為是一種過程與概念，指涉的是一些特定的演進現象…這包括兩個廣泛的主題：即現代化、國家主義與政治發展，以及經濟發展與技術傳佈」(Mowlana, 1997:185-186)。

Hardt 指出 (1992:12-13)，大眾傳播學強調影響效果與國家發展的研究，主要是受到了 1920s 年代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 與新達爾文主義 (neo-Darwinism)，以及 1930s 年代功能論 (functionalism) 所影響。其中，實用主義為這個時期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基礎，使得傳播學更加遠離歷史與基礎研究的取向，而成為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 與行為學派 (behaviorism) 的一環。進一步來說，新達爾文主義的演化思想，促使發展傳播學強調都市化成長與現代化階段性發展的重要。功能論則強調將個人整合到生產、消費的社會體系與過程之中，使傳播研究重視媒介體系對個人態度與行為的形成。功能論大師 Parsons 的社會體系 (social systems) 與均衡 (equilibrium) 思想，則對大眾傳播與媒介生態體系在社會體系中所扮演的整合功能提供了啟示。

1950s 到 1960s 電視開始蓬勃發展，也是美國傳播研究建立其基礎的階段，這時期的美國傳播研究，逐步遠離原先奠定基礎的社會學、心理學與政治學學門，發展自己的學術定位。此時期的主流傳播學術，多集中在大眾傳播的功能與效果的研究，重視訊息效果、政治宣傳、科技觀念傳布以及媒體涵化功能的研究。回顧這個時期傳播學者的主要研究內容，可以發現若不是在討論媒介訊息的效果，如對政治或廣告訊息的態度或行為研究，就是在討論大眾媒介的社會化功能，包括媒體訊息對

社會價值的影響、促進社會化與教育的功能、以及對國家經濟、政治民主的貢獻等。此時期「子彈理論」盛行，視大眾媒體擁有超級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發展傳播則奠基在這些效果研究、社會化影響、以及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之上，以媒體功能與傳播效果為前提，對內（國家）散佈新思維、促進整合與溝通，以提昇經濟成長率；對外（第三世界）促進現代化發展，彌平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鴻溝，利於將第三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體系之中。

Lasswell 在 1940 年代末提出的經典名句：“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重視媒介訊息內容的傳遞過程與效果，在我看來，這種重視效率與訊息效果的觀點，是奠定發展傳播不可或缺的基本論述，促使發展傳播研究重視發展相關訊息的散佈過程與所產生功能。

無論是對商業廣告訊息或政治宣傳 (propaganda) 的研究而言，Lasswell 的觀點都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此時期的閱聽人研究，也是集中在分析大眾（被動地）接收了那些媒介訊息、如何（透過大眾媒體）接收到這些訊息、進而受到了那些（態度、認知、行為）的影響。一方面，行銷傳播的領域，針對資本社會的生產如何透過廣告或新聞活動，散佈商品訊息給對閱聽人（消費者），以發揮影響力並促進消費。另一方面，態度改變與說服 (persuasion) 的研究，則是意圖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改變個人或社會的價值與信仰。這些研究多採取行為學派的觀點進行分析，強調效果、說服、以及個人的學習與反應。

就說服或宣傳方面的研究而言，Hovland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曾經為美軍進行相關的研究，後來也針對心理學中的人格特質加以深入探討，從微觀的角度進行訊息內涵、個體與說服效果的研究。McGuire 則在 1960 年代初期，提出「預防注射理論」(inoculation theory)，以事前預防的觀念來抵抗說服與媒體訊息的洗腦。來自奧地利的社會學家、自稱是「歐洲實證主義者」(European positivist) 的 Lazarsfeld，在 1960 年代末研究政治宣傳的媒體效果與投票意向之議題，並與其他學

者共同發展出「二級傳播」(two-step flow hypothesis) 的論述。這個論述提出意見領袖是訊息傳遞的重要中介，挑戰大眾媒體直接穿透個體的效果論述。同樣的，Rogers 在 1960 年代初最先提出「創新傳布」(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的觀點，說明具有創新、發展意涵等新觀念的傳播與接受過程，因「採用者」(adopters) 特質不同而對新觀念接受的程度有所差異，故發展傳播需要重視傳播過程中閱聽人的觀念養成與態度改變。無論是二級傳播觀點或創新傳布理論的研究，都是著重在訊息接收與影響效果層面上的討論，實用主義傾向相當濃厚。

此外，在 1960 年代時期，與發展傳播相關的論述，尚有 Gerbner 提出的「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透過對電視戲劇的社會化研究，Gerbner 說明電視如何透過涵化機制影響閱聽眾的基本假設與態度，並探討此過程對維持社會穩定的助益。基本上，這也是一個強調大眾傳播對社會態度與價值形成的觀點。發展傳播與涵化理論相輔相成，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或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都市化發展，都必須藉由大眾媒體的涵化功能來達成。發展傳播除了奠基在以效果或說服研究為主的實用主義之外，更深地受到二次大戰之後興起的現代化理論之影響。1950 年代末期，社會學家 Lerner 除了傳承社會學家涂爾幹所主張的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演進觀之外，並大力倡導大眾傳播對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尤其對傳統社會而言，大眾傳播是重要的國家發展工具。學者 Perry 指出 (1996:130)：

Lerner 認為現代化首先要從都市化開始，而若要使都市的居住發揮功能，則大大地需要使市民懂得知識 (become *literate*)。這種素養 (literacy) 則能引導到 Lerner 所謂的媒體參與 (media participation)……最後，媒體參與會對財富、政治穩定與民主政府產生貢獻。

聯合國在 1950 與 1960 年代也運用了所謂「中介傳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 的可能性來推動各個國家的發展，聯合國科教組織

(UNESCO) 在 1962 年時委託 Schramm 執行一個名為「大眾媒體與國家發展」的計畫，此計畫在 1964 年出版的成果中指出：「大眾傳播若運用得當，真的可以對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非常顯著的貢獻」(Perry, 1996:130)。由此可知，從發展傳播的角度而言，大眾傳播的影響力與現代化的進程是息息相關的。不過，這種企圖透過電視與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說服大眾接受一些觀念，進而促進國家發展的作法，是一種典型由上而下、菁英領導的決策模式，將大眾視為是被動接收訊息的「受眾」。同時，雖然稱為現代化，其實本質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化的發展經驗為標準，發展傳播的觀點並未區分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也完全沒有考慮不同文化傳統間的差異與需求。

不過值得注意的，雖然在 1950 與 1960 年代美國的傳播學術界以「發展傳播」、「實用主義」與「現代化理論」為主流論述，但學圈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其中最強大的是由數位德國學者所建立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sup>(1)</sup>此外，北美傳播圈當時尚有加拿大學派學者 Innis 與他的學生 McLuhan，在這段期間陸續出版了許多著作，這些著作採取宏觀研究的視野，以跨領域的知識為引用之經典，未探討效果、宣傳的研究，在當時被美國主流傳播學界所忽視，但近幾年來 McLuhan 的著作卻受到廣泛的重視而儼然成為一門顯學。<sup>(2)</sup>1960 年代間，在英國另外形成了一個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的學術傳統，由 Hoggart 與 Hall 領軍，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建立「現代文化研究中心」，部分觀點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此中心明顯採取左派觀點，並批判流行文化與資本主義的大眾文化。雖然這些「另類」學派，未參與也不重視發展傳播的觀點，但由於這些力量過小，所以無法改變發展傳播成為當時傳播學術的主流思想。

## 貳、世界體系、資訊資本主義與全球化

建立「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 的學者 Wallerstein，2001 年在世新大學主辦的「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研討會中，發表“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一文，他從 15 世紀起資本主義的萌芽開始談起，觀察長時期的歷史發展軌跡，指出當前全球化的論述及其所探討的許多面向，從世界體系的觀點來看，並無新意，其實是資本主義體系在面臨危機時的重整、轉型、與尋找新出路的一個現象。Wallerstein 指出：

1990 年代，全球化論述氾濫成災。幾乎每個人都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有史以來首度活在全球化的年代裡…卻嚴重誤判了當前的現實。全球化論述是有權有勢者強加給我們的騙局，或更糟的是我們加諸己身的迷惑，導致我們忽視眼前的真實議題，誤解了當前的歷史危機。全球化指涉的過程一點也不新，已經存在了五百年。我們目前站在轉變的時刻上，但這轉變不是少數落後國家要迎頭趕上全球化的精神，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要轉變為不同的面貌 (Wallerstein, 2001 / 王志弘譯)。

全球化，對許多人而言，是促進全球發展的一帖良方，無論是對西方核心國家、新興工業國或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全球化這個名詞已經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國與國之間不平等發展的概念，所有國家似乎在這個新的局面下都有成功的機會，全球化普遍的被樂觀地期待著，它是一種透過新科技與資訊高速公路來重建經濟秩序的新希望。

在全球化的發展下，資本主義體系將轉變成什麼樣的面貌？部分學

者提出「去地域化」、「彈性生產」與「全球地方化」的論述，或如 Castells (1996) 所提到的網絡社會，已非傳統所認知「地方的空間」(the space of places) 的物理格局概念可以來解釋，而是一種新的空間過程與新的空間形式，稱之為「流動的空間」(spaces of flows)。<sup>(3)</sup> Lent 則在〈「發展傳播」與「全球化／數位化」：是否相互矛盾？〉一文中提到：許多學者認為「新資訊科技可以打破距離限制、打造地球村、壓縮時間與空間、以及帶來媒體數位匯流等等」說法，忽略了國家之間一直存在的平等現象 (Lent, 2005 / 劉昌德譯, 2006)。雖然 Wallerstein 在剛才的引文中指出「全球化論述是有權有勢者強加給我們的騙局」，不過，到目前為止，全球化的概念並未被建構成是西方強權經濟、文化、或媒介「帝國主義」之代名詞。但需要探究的是，到底誰（指的是國家、集團或跨國體）最積極推動全球化？誰從中獲利最深？而誰在全球化重構的過程中被犧牲？又，全球化發展為誰提供出路？為誰解決危機與問題？

在這些西方強權當中，Wallerstein 指出美國是一個代表性的關鍵，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核心國家 (the core)，自二次大戰後就面臨了資本主義體系長期發展上的危機與挑戰。

1945 年美國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等制度，與蘇聯達成雅爾達協定，以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達成了利用其經濟優勢所需的世界秩序，創造了對美國產品的有效世界需求。但美國於 1960 年代遭受日本與西歐的競爭，世界生產過剩導致利潤率下滑…世界歷經 1970 年代石油危機、1980 年代第三世界債務危機…雷根的軍事凱因斯主義導致的龐大國債…1990 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伊拉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亞洲危機等。這些導向了衰退的最後階段…1450 年迄今的時期，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萌芽發展，到目前邁向終極危機的生命週期 (Wallerstein, 2001 / 王志弘譯)。

所以，在重重危機的壓力驅使之下，也不難瞭解，美國為何會成為全球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推手。Castells 奠基在世界體系理論的預設之

下，運用「全球化經濟」(global economy) 一詞分析資本主義權力的擴充如何建構了流動空間，並以「資訊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概念來解釋網絡社會，他強調國際生產分工模式的空間分布與全球城市資訊流通之重要性，並重新詮釋核心與邊陲之間的定位，以美國為核心，由西歐、北美與亞太地區新組成的「三強權」(triad power)。Castells 此觀點之提出，有助於瞭解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核心強權與半邊陲、邊陲地區或國家之間的各種空間流動、剝削型式、資本複製、與權力分配 / 重分配之關係 (郭良文、柯裕棻，2000)。

在以全球化為依歸的數位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下，第三世界國家並沒有因此而獲得特別的好處或發展契機，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現象依舊沒有得到較大的改善。Mowlana 指出，核心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就資訊交換面而言，數位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類似工業資本主義。如同貿易產品與原料的流動方式一樣，數位時代下的美國或其他已開發國家將處理好的資料 (processed data) 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將原始資料 (raw data) 輸出到這些已開發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欠缺整合與呈現其利益的有效傳播，對工業國家世界的依賴關係益加彰顯」(Mowlana, 1997:113)。

Thussu (1998:64-66) 也指出核心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長期存在著資訊不均衡與資訊不平等的問題。“The information rich North” 相對於 “The information poor South” 的狀況依舊存在。並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堅持要使資訊自由流通，加速了電訊傳播、媒體與電腦工業的匯流，也促使西方衛星與有線電視，在媒體帝國 (media empires) 的推動之下加速擴充至南半球國，跨國企業 (TNCs) 與媒體集團在國際廣告的推波助瀾之下進行企業宣傳，將商品行銷至第三世界國家，透過全球與地方媒體的強力放送，促使南半球國發展「資訊娛樂產業」(infotainment)。McChesney (1998:32-35) 即指出，自 1990s 起時代華納 (Time Warner) 與迪士尼 (Disney) 雙雙成為跨國媒體巨人，時代華納控制華納兄弟影城、CNN、HBO，迪士尼則擁有美國 ABC 電視台、迪



士尼與 ESPN 國際電視頻道，兩者均投資許多國家的電視媒體的股權，因而成爲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視新聞與影視娛樂媒體，更有利於發展第三世界的資訊娛樂產業。第三世界得到的資訊往往是由強權國家所設定好的議題，Lent (2005 / 劉昌德譯，2006) 指出這些跨國企業財團往往傳遞相同的訊息，把人們的日常生活詮釋爲各種待價而沽的商品。對於有違他們利益的消息與新聞，就加以封鎖或扭曲，並且忽視最底層的人民。

同時，在生產、勞力與商業交換的國際化發展中，跨國企業是數位資本主義發展中獲益最大的實體，從個別國家的管轄下轉向與其結盟的超國家體 (suprastate bodies)，透過如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金融基金 (IMF)、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 等這些屬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推手，促使制訂有利於 TNCs 全球化的發展政策 (Thussu, 1998:3; McChesney, 1998:27)。全球媒介體系 (global media system) 的興起，與此發展關係密切。McChesney (1998:29) 指出，新自由主義學派 (neo-liberalism) 強調自由市場貿易，對全球市場的形成有助益。同時，市場開放有利 TNCs 滲透入地方、個別國家媒體的力量愈加強大，超國家體也難以抵制。Lent (2005 / 劉昌德譯，2006) 堅信新資訊科技在第三世界的傳布與發展，其背後的趨力是商業利益而非人道主義。因此他認爲把「發展傳播」與「全球化 / 數位化」放在一起，互不相容，所以是一個矛盾的想法。

### 參、知識鴻溝的擴大：數位落差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 普遍被認爲是各國進入全球化體系的必備條件。NII 源自美國 1990 年代的傳播政策，國會、白宮與聯邦傳播委員會在當時先後發表聲明支持資訊高速公路的發展。克林頓政府在 1993 年針對國家資訊基礎建設提出

「行動綱領」，闡明政府鞏固資訊工業結構的政策。進而在 1994 年 3 月間，美國副總統高爾在聯合國電訊傳播會議中，首次提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全球版本－即「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 (彭慧鸞，1997：46)。到了 1995 年 2 月，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等國所組成的七國高峰會，亦在布魯賽爾的會議中，採用美國的說法，至此，GII 的理念正式被主要工業資本強權運用來推廣其資訊全球化的方針 (Bettig, 1997:145)。然而，1990 年代啟動的全球資訊基礎建設政策，卻類似美國在 1950 與 1960 年代所推動的現代化發展傳播政策，沒有因為如此而讓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過去面臨的問題獲得解決，這或許正是 Lent 所說的根本是在「向鬼拿藥單」，所以治癒不好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鴻溝。包括 Mosco 也指出 (2005 / 羅世宏、唐士哲譯，2006)：「或許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同時伴隨著不平等的大量增長，窮國與富國之間深化的落差，在近用基本資源上的落差，包括驅動我們的神話的傳播科技」。

數位落差的現象普遍存在於不同國家之間，同時也存在於一個國家的都市與鄉村、中心與偏遠地區、以及主流族群與原住民部落之間。數位落差問題不只是“wired”或“not wired”這樣簡單的問題，雖然傳播科技設備與普及率、電腦硬體與軟體配備、速度與連線品質，以及購買與維護經費等面向都是基本而且至導致數位落差的重要因素，但數位落差之成因，並非只是「科技工具擁有或近用與否」與「人口變項」之間的問題而已，還有許多其他更重要的文化、社會因素，深深影響資訊鴻溝的跨大。試想：若人人都擁有一部相同功能的電腦，數位落差的現象就可以消弭了嗎？試想：過去幾年來，女性使用電腦的人口比例已經與男性相仿，這可以說明性別間的數位落差已經即將消失了嗎？Kellner (2002:91) 指出：「最新的調查顯示，數位落差的主要指標不再是種族與性別，而是階級與教育的差異」。什麼是影響這些非本質性、社會性因素的原因呢？

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如科技教育內涵、教師素質、資訊素養、

以及使用科技或網路的習慣與用途等。因此，有沒有得用（設備）是第一層次的問題，而影響數位落差發展的深一層次問題還包括：會不會用（素養／能力）？如何用（用途／應用）？用來做什麼（目的／結果）？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使用方向（發展／期望）？Rojas et. al. (2004:115) 運用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等概念進行數位落差的研究，自創「技術資本」(technocapital) 的概念，引入科技的階級習癖與場域的形成分析，並指出影響「科技習性」(technodispositions) 養成的指標性因素，包括社會實踐、認知與態度、科技教育、對科技的知曉程度、對資訊的渴求、工作需要、社會關係、社區互動、與地理區域等。

van Dijk (2004:234-236) 更進一步建構出一個解釋模式，強調技術與非技術性層面同時考慮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新媒介「四階段動態循環模式」內容為：1. 心態近用 (mental access)，使用者是否因電腦焦慮與缺乏動機而排斥新科技，即“information want-nots”；2. 物質近用 (material access)，評估硬體設備的擁有情形，這點即是早期數位落差文獻所強調的重點；3. 技巧近用 (skill access)，包含「工具的」、「資訊的」與「策略的」三種類型技巧，重視介面的使用者方便性 (user-friendly) 之設計；4. 使用近用 (usage access)，主要是指不同的應用情形。以上這四個階段具有接續性、累積性與循環性。其中，使用近用被預測是未來創造資訊不平等的最大原因。由此可知，造成數位落差的社會性因素相當複雜，從心態、設備、技巧、策略、到運用都有相關，推廣一體適用的全球化資訊基礎建設，原則上並不能真正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弭平所面臨的數位落差問題。GII 經過十年來的推廣以後，到現在卻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數位落差的現象並沒有因資訊社會「全球化／數位化」的快速發展而有減緩的趨勢。

## 肆、結語：多元資訊素養與在地實踐

1950s 與 1960s 的發展傳播與現代化，除了少數新興工業國家之外 (NICs, 包括亞洲四小龍與巴西、阿根廷等)，並沒有成功地將多數第三世界的國家變得如西方般的現代化。當時從拉丁美洲學術圈發展出來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就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一種反動。1990s 與 2000s 的數位資本主義發展，則並沒有縮減北半球國與南半球國的差距與數位落差，這一時期的「資訊發展傳播」顯然和戰後「現代化發展傳播」在資本主義擴充、與西方國家鞏固強權、回應危機的本質上並無不同，所不同的主要是 Castells 所講的「資訊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型態，以及更兩極化的國家陣營區分，即由西歐、北美與亞太地區新組成的「三強權」相對於以非洲與中南美洲為主的陣營。不過，若依 Wallerstein 的觀點，全球化的迷思，在於其掩飾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所面臨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危機。所以無論是 1950s~1960s 或 1990s~2000s 所建構的兩種發展傳播的理念型態，其實是分別在工業資本主義與數位資本主義之下，強化體系、回應危機、並重建秩序的強權意識型態與迷思。

如何面對數位資本主義的擴張，並解決日益擴大的數位落差問題？針對數位落差這個部分，Kellner (2002) 提出一個建立「多元素養」(multiliteracies) 的教育改革觀點，來試圖減緩數位落差的擴大。他指出在面對急遽的科技變遷與多元文化社會的發展當中，多元素養與「新素養」的開發，以及在民主化的概念下進行教育改革是相當重要的。所謂的多元素養，包括新形式的「媒體素養」、「電腦素養」、與「多媒體素養」等新知識體系。Kellner 也提出「科技的批判理論」觀點，採取非決定論觀點、強調運用科技來增進「賦權」(empowerment)、推動「多元文化民主」、以及克服「落差」問題。未來的展望則希望能透過新素

養的建立來降低數位落差，Kellner 指出，新的技巧與能力是資訊變遷時代中必須具備的內涵，所以也需要新的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案來培養。多元素養的培養、賦權與市民社會參與、以及教育改革是數位資本主義時代下求生存與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方法。不過，Kellner 的理論對西方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啓示較大，對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在三餐不飽的現實環境之下，要能談教育改革或多元素養學習，則似乎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

在地人民的實踐，包括媒體素養的提昇，培養對全球化媒體訊息反省的能力，或者以參與式傳播、或社會運動方式建構市民社會的力量，或許是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在地抵抗 (local resistance) 的重要作法。Lent (2005:38 / 劉昌德譯，2006) 指出，他曾在 1960 年代去菲律賓講學，並與當時剛成立的「菲律賓新聞機構」一起合作，希望把當地煽色腥且菁英取向的新聞媒體，扭轉為具有社會意識、對社會有用的「大眾」媒體。作法包括邀集菲律賓新聞工作者參與一系列的研討會，讓他們吸收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的觀念與資訊的同時，也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Lent 這種「參與式發展」的作法，是在親身傳播的情境中進行教育與分享，是形成草根力量、反省全球化霸權的一種動員方式。Lent (2005:39-40 / 劉昌德譯，2006) 也提到巴西學者 Freire 在 1972 年出版了《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書，提供了與發展傳播典範很不一樣的觀點。Freire 的主張包括要相信人民在壓迫的環境下仍有學習、成長、與自我教育的能力；主張要直接接觸人民的真實處境，並瞭解社會結構及官方限制；要超越「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區分，把彼此都放在學習的過程中；以及要有自由的對話與參與解放行動的能量。在地人民的實踐與賦權，的確是對抗全球化媒體與資本主義力量的一種重要在地化策略。

## 註釋

- (1) 包括 1930 年代末期為躲避德國納粹暴行而移民到美國的學者 Horkheimer 與 Adorno，以及 1950 年代初期到美國教書的 Marcuse，奠基在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他們從批判理論的角度解構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後繼者如 Habermas 也在 1960 年代初期出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一書，影響深遠。
- (2) Innis 在此時期的主要出版著作為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 以及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1952)；而 McLuhan 的重要著作包括 *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 *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 以及 *Understanding media* (1964)。由於 1980 年代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全球的風貌，使 McLuhan 先前所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 概念，廣泛地被全球化與網路社會研究學者所討論。至本世紀初，許多著作都與 McLuhan 相關。
- (3) Castells「流動的空間」(spaces of flows) 概念，具有組織時間的能力 (Castells, 1996:376)，且在共同分享同一時間的模式下（即共時性），經由各種「流動」的進行，包括資本流動、資訊流動、技術流動、組織互動之流動、以及影象、聲音與符號的流動，透過「物質組織」的影響來進行的一種「社會實踐」。

## 參考書目

- 王志弘譯 (2001)。〈全球化或轉變的年代？：世界體系軌跡的長期觀點〉，「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研討會。台北：世新大學主辦。(原文 Wallerstein, I. [2001].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 郭良文、柯裕棻 (2000)。〈網路空間之型塑與台灣網際網路的發展〉，《世新大學學報》，10:187-219。
- 彭慧鸞 (1997)。〈亞太地區的科技競爭與合作：「科技資訊協定」的政治經濟意涵〉，《問題與研究》，36(2):33-47。
- 劉昌德譯 (2006)。〈「發展傳播」與「全球化 / 數位化」：是否相互矛盾？〉，《中華傳播學刊》，7：37-52。(原文 Lent, J. A. [2005].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digitalization: An oxymoron?*。中正大學「第二屆數位傳播國際研討會」專題演說講稿)
- 羅世宏、唐士哲譯 (2006)。〈傳播全球化：數位時代的神話與權力〉，《中華傳播學刊》，7：3-15。(原文 Mosco, V. [2005].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Myth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中正大學「第二屆數位傳播國際研討會」專題演說講稿)
- Bettig, R. V. (1997). The enclosure of cyberspa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138-157.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Kellner, D. (2002). New media and new literacies, in L. Leah & L. Sonia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pp.90-104). London: Sage.
- McChesney, R. W. (1998). Media convergence and globalisation, in D. K. Thussu (Ed.),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pp.27-46). London: Arnold.

- Mowlana, H. (1997).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 Perry, D. K. (1996).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Rojas, V., Straubhaar, J. Roychowdhury, D. & Okur, O. (2004). Communitie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n E. Bucy & J. Newhagen (Eds.), *Media acces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new technological use* (pp.107-130).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hussu, D. K. (1998). Introduction & Infotainment international: A view from the South, in D. K. Thussu (Ed.),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pp.1-10, 63-84). London: Arnold.
- van Dijk, J. (2004). Divides in succession: Possession, skills, and use of new media for societal participation, in E. Bucy & J. Newhagen (Eds.), *Media acces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new technological use* (pp.233-254).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智慧藏